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成果
四川省“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成果
本书出版受华夏英才基金支持

审美意识形态的 文本分析

冯宪光 马睿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成果
四川省“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成果
本书出版受华夏英才基金支持

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

冯宪光 马 睿 著

2001年·成都

责任编辑:吴雨时
责任校对:严伟君
封面设计:冯 军
责任印制:曹 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冯宪光著. —成都:四川
大学出版社,2001.11
ISBN 7-5614-2254-7

I. 审... II. 冯... III.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IV. B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395 号

书名 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

作者 冯宪光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印刷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93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5412526/5414115/
5412212 邮政编码:610064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印刷厂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冯宪光 男，1945年12月出生
于重庆市，现任四川大学中文
系教授、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
会副会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
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文学价
值的追求》、《西方马克思主义
美学研究》、《马克思美学的现
代阐释》等。



马睿 女，1972年11月出生
于重庆。1990年进入四川大学中
文系学习，1997年获文学硕士学
位，同年留校任教，2001年获文学
博士学位。主要研究20世纪西方
文论、中国近现代文论，已在国
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
十余篇。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语言学转向”向当代文艺学提出的挑战……	(1)
一	当代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已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3)
二	语言学转向对当代文论的新的促进……	(11)
三	语言学转向对中国文论的启示……	(25)
第二章	西方文论中的语言学转向……	(36)
一	语言学转向开拓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新方向……	(36)
二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	(47)
三	结构主义诗学……	(62)
四	英美新批评文论……	(81)
五	现代文学解释学……	(101)
第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语言学转向……	(120)
一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特点……	(120)
二	沃尔佩的语义辩证法理论……	(130)
三	阿尔都塞的文本阅读理论……	(146)
四	戈德曼的结构主义文论……	(166)
五	马歇雷的文本分析理论……	(182)
六	杰姆逊的文化解释学理论……	(201)
七	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诗学理论……	(214)
第四章	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思路……	(231)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本体论问题……	(231)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视点……	(242)
三	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	(251)

第五章	文学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结构·····	(268)
一	文学文本的语言特性·····	(270)
二	文学文本的结构方式·····	(282)
三	文本中意识形态向审美的转化·····	(297)
第六章	汉语文学文本的隐喻结构分析·····	(313)
一	汉语的诗性特征·····	(314)
二	汉语文学文本的隐喻结构·····	(332)
三	汉语文学文本分析示例·····	(340)
后 记	·····	(368)

第一章 导 言

“语言学转向”向当代文艺学提出的挑战

我们站在这里,此时此刻,正领受着 20 世纪落日的余晖,而且明确地知道 21 世纪的曙光即将展现在眼前。我们当下正处于世纪之交的时间点,此刻连接着过去和未来。^① 在瞻望前程的时候,不能不回顾我们将要告别的这一世纪的成果和 20 世纪为下一世纪所留下的问题和任务。此刻,我们既要回顾,又要前瞻。每一个世纪的成果,同时又提出和留下了新的有待解决和突破的问题。有的时候,一个时期的学术成果、成就本身就潜藏着新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有待于跨世纪的人们去攻克和解决的。

从 19 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就包含其中了。而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时起,就是一种创新的科学思想体系。它的创新机制在于,它并不提供包罗万象的现成结论,并不执守固定的教条,而是综合人类以前一切思想的精华,建立了人类在当时所能够达到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思维方法论;而是能够不断面对新的现实,多方面吸收各种思想成果,对现实与未来,对不同地域、民族的种种复杂问题,进行审视和处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道路。

20 世纪的中国文论是在中国走出闭关自守的封闭格局之后,

^① 本书初稿写就时,时逢世纪之交,故有此语。

在中西文化、文论碰撞与交流的复杂关系中向前发展的。20世纪给中国的位置是中国再也不能闭关自守、封闭自足的发展。现代化给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冲击,就是冲破闭关自守的日常生活格局和文化格局。在20世纪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而施行单独的政治、经济政策。文化上也是如此。20世纪中国文论必然走向与世界文论总体趋向接轨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如此,今天的改革开放所造就的新时期也是如此。新时期以来,中国引进和介绍西方文论的速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中国文论在改革开放以后,力图以最快的步伐追赶世界文论的高度和水平。我国新时期文论起步于对极“左”文艺观点的拨乱反正,实际上就是起步于对文艺学科学方法论的探索。大家力图寻找一种科学的、现代的文论模式,而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学习西方文论之长。这里有盲目追随、模仿西方文论的简单化倾向,但是从总体上说,在引进的同时,又在进行反思和调整。

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文艺学方法论探讨的热潮,但这种方法论的探讨体现为两大潮流,当时人们认为西方20世纪文论有两大潮流,一个是人本主义潮流,一个是科学主义潮流。国内文论的革新也是从这两大潮流入手或选取着眼点、立足点。从人本主义潮流的引进来看,不仅重新评价了康德美学思想,而且对现代的存在主义美学,也多有吸收,于是就出现了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艺学等等。人本主义潮流的引进,有得有失,此处不予评论。而选取科学主义潮流的人,则主要集中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和融合上,出现了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用于文艺批评的一些尝试。但是因为文艺理论界,大家对这些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方法,缺乏学习和研究,甚至还没有起码的知识,这种方法论探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都是划入科学主义的潮流来认识 and 理解的。这种认识在近年来有所改

变。我们对西方文论在当代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从形式主义文论所开始的文论潮流体现了西方人文科学语言学转向的趋向。在这一认识的影响下,我国文艺学开始对用语言学范式来建构当代文艺学方法的途径,作了一些探索。我认为,这一次对语言学转向的重视,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文论真正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契机。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 当代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已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首先,我们在总结 20 世纪文论发展轨迹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是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文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和重要动力。

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引论》的作者序言中指出:“倘若人们想确定本世纪文学理论发生重大转折的日期,最好把这个日期定在 1917 年。在那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学派理论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作为手法的艺术》。”^①伊格尔顿把俄国形式主义的崛起,看作是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转折点,是很有道理的。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的本体放置于作品本文之上,在文学理论领域实现了研究重心从主客体关系到语言文本关系的转移。这就是文学理论领域的语言学转向。20 世纪文论的发展证实了语言学转向影响了整个世纪的文论发展的方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俄国形式主义在当时的苏联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一批人很快就转移到捷克,对

^① [英]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第 1 页。中译本人名为“谢洛夫斯基”,所写文章为“作为技巧的艺术”,现按国内学术界通行译法,将人名改为“什克洛夫斯基”,文章改为“作为手法的艺术”。

语言文学的形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诗学,形成有名的布拉格学派。这一趋势对于当代文论实现了结构性的,甚至是本体论的调整和转变。这对于世纪之交的人们来说,很有认真研究的必要。结构主义诗学的集大成是法国结构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就是在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诗学的基础上前进的。现在比较热门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都有结构主义诗学的影子。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美学,受到结构主义冲击以后,偃旗息鼓,但其余绪,流变而为解释学,解释学具有丰富的语言学内涵,这是不言自明的。

文学理论中出现语言学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西方哲学文化思潮在 20 世纪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一语首先是由柏格曼在《逻辑与实在》(1964)一书中提出。柏格曼指出:“所有的语言哲学家,都通过语言的准确叙述来叙述世界。这就是语言学转向,也是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关于方法论的根本一致的共同出发点。”^①后来美国学者理查·罗蒂依据柏格曼的这一说法,在 1967 年编辑了名为《语言学转向》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收集了探讨现代语言哲学与以往本体论、认识论哲学的不同思路和方法的若干文章。罗蒂在全书“导论”里认为,语言学转向是一场哲学革命,它通过对现成语言的理解和变革,可以解决目前在哲学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可以消解若干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这是哲学方法的转型,也是哲学问题的转型。^②这一论文集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语言学转向”的划时代的哲学研究形态、问题、方法的转型得到学术界公认。

① [美]柏格曼:《逻辑与实在》,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64,第 177 页。

② [美]罗蒂编:《语言学转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67,第 3~4 页。

大家知道,美学与文论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基础是哲学提供的。一定的美学、文论总是特定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展开和运用。文论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说,来自哲学的整体的语言学转向。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士目前所持有的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研究重心发生了几次较大的转移。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在《语言交往的先验概念与第一哲学的观念》中明确地概括了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的三次根本性转向。他认为继古代的本体论的物的分析和近代认识论的意识分析之后,语言分析是现代哲学的“第一哲学”范式。20世纪已经完成了从意识分析的认识论到语言分析的语言学转向。^①

首先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其重心是研究世界的本体论问题。当时的哲学正在从直观的朴素思维向精细的系统思维过渡,力图在一与多的关系中,用统一来理解杂多,又在多样的现象中寻找出统一的本质。他们从世界存在的具体事物入手去研究什么是世界存在的本体,构成世界存在的根本要素是什么。这也是一种“物的分析”。柏拉图把理念确定为世界的最高本体,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在美学和文论上,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美,什么是超越一切具体的美的事物之上的美的本体。于是,就有了苏格拉底的“美就是善”的命题,就有了柏拉图的“美本身”的命题。柏拉图的“美本身”就是美的本体,美的最高本质。“美本身”在柏拉图看来,也是与世界的最高本质“理式”联系在一起。从柏拉图这里,开始了一种传统,即是在美学与文论的研究中,把对美与艺术的本质的探索,作为一个根本问题,甚至是这门学科的终极问题。

其次,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17世纪完成了西方哲学的第二次

^① 参见[德]阿佩尔:《哲学的改造》,“译者的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第4页。

转折。他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提出了在哲学中研究主体认识的意义。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来说,只有人在思维时,人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人是理性的、思维的动物,这是人与其他物种的根本区别。因此,哲学对世界本体的探寻,应当而且立刻从本体论转移到认识论。认识论的问题是通过对人的意识心理的各个要素和环节进行分析,去寻找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怎样认识世界,我们有什么认识能力等等问题的答案。这也是“意识分析”。这就是认识论哲学的时代,从此在美学与文论上开始了一个认识论美学、认识论文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1847年鲍姆加通为美学命名,就把美学界定为感觉学,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康德虽然在人本主义立场上,人与世界的关系上找到了审美的位置,但他主要还是从人的主体心理功能上说明为什么人有审美的需要和审美的能力。这还是从人的心理认识活动的环节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所谓感性显现,仍然是从认识论上提出问题。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美学和文论都是认识论美学、文论。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反映论和艺术的形象思维特征等等,都是认识论角度的理论。

再次,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哲学出现了向传统理性主义的挑战。一些人提出,理性主义对事物本质的规定,是先验的,是本质先于存在。而这些本质规定,也无非是一些名词,在名词下面没有实在的东西,实质是一种“空壳”。在20世纪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就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语言意义的分析。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哲学不应当直接研究外部世界,这是由各门经验科学承担的职能,传统的认识论哲学把研究重心放在主体与外在客体世界的关系之上,这样,哲学只能研究人的理性、人的心理意识,而这种研究的对象也不是许多部分尚为隐秘的人类全部的内心世界,而是由现成语言所能够表达的思想及理性。人们在交流中使用的语言,其意义是理解人的心理

思想和理性的基础和前提。正如艾耶尔所说,“罗素和布拉德雷断言,如果你想要理解思想,你就必须考察语言,因为正是语言表达了思想。”^① 比如,真善美这些概念,如果作语谕学的分析,那么就可以发现是有歧义的。不同的人对真善美有不同的看法。这说明传统哲学、美学在定义时往往从一种先验的理论前提出发,构造一种单义的定义。而科学的理论就必然建立在对传统形而上学先验前提的颠覆上,转而对对象的语言符号的分析之上。这是“语言的分析”。

三种哲学文化的转型,就是从物的分析,转移到意识的分析,再转移到语言的分析。

到了海德格尔,他明确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们认为,人天生就有语言。人们坚信,与动植物相区别,人乃是会说话的生命体。这话不光是指,人在具有其他能力的同时也还有说话的能力。这话的意思是说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② 海德格尔把语言视为人的根本标志,是人的存在的根。人在语言中存活。卡西尔也说,“人是语言、符号的动物”,而不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社会动物、政治动物”,也不是笛卡尔所说的“理性动物”。^③ 他们的这些思想提出了人、社会、语言三者的基本关系,人在语言中活动,在语言中存在,社会也是在语言中活动,在语言中存在。语言是人和人存在的根基,是人和社会的标志。只有抓住语言,才能抓住人和社会的根本。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使用语言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和

① [英] 艾耶尔:《哲学中的变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31页。

② 《海德格尔选集》(下),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981页。

③ 参见[德]卡西尔:《人论》“总结与结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281~287页。

活动方式,也即是文化方式。美国人类学家 A·怀特说:“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正是语言符号才使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转变为人类,并成为人类,仅仅由于符号的使用,人类的全部文化才得以产生和流传。”^①“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就仅仅是动物而不是人类。”^② 法国语言学家 E·本维尼特指出:“语言为人所固有的能力的最高形式,即使用符号的能力。概括而言,这个词指用一个记号去表示实在物的能力,和理解表示实在物的‘记号’的能力,因此就在一事物和另一事物之间建立了‘意指’的关系。”^③ 这就是说,语言是人和世界以及人与他人之间关系重要的中介物。而这一中介物是一个象征系统,通过语言可以理解和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语言实际上就成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环节和切入点。这一思想对当代哲学、美学、文艺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应当说,俄国形式主义等等当代注重文学艺术语言文本的文论学派的兴起,与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有密切关系的。

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哲学主题的三次大的转变,的确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事实。古希腊第一次对哲学主题的确立,开拓了哲学的道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开始了近代哲学的新纪元,而 20 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则应当是现代哲学的新的方向。这一事实的出现,以及西方哲学家们从人类思维的发展脉络,从哲学主题内部所作的分析,有许多可取之处。对于文论来说,就有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谈论的从外部研究转移到内部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马克思创立开始,在它的形成阶段,正是西方哲学第二阶段认

① [美]怀特:《文化科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 21 页。

② [美]怀特:《文化科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 32 页。

③ 转引自[法]保罗·利科编:《哲学主要趋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第 354 页。

识论美学和文论大盛其时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文学艺术问题时也有不少从认识论立场和主客体关系出发立论的论述。特别是马克思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依循认识论的思维框架,建立了一种比较完备的认识论美学文论,前苏联的文学理论就是典型代表。在这种思路影响下,我国建国后的美学文论也主要是认识论美学文论。而对于语言学转向,我们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缺少思想准备,导致我们目前还有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讨论文学艺术作品时,仍然持有比较陈旧的思路和术语,显得缺乏应有的时代感和理论的生命活力。

当然可以看到和注意的是,20世纪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对于语言学转向有比较深切的理解,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之一,是把目光注视到资产阶级的当代文化成果,提出要向马克思当年吸收黑格尔辩证法一样,接受当代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于是他们相当注意20世纪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的发展演变情况,并把其中某些认为可取之处,作为改造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对于语言学转向的思想文化潮流的关注,也不例外。比如瑞典理论家约奇姆·伊斯雷尔就在《辩证法的语言和语言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我赞成并论证一种实在论立场,它不是现象论的实在论,即不把知觉和感觉经验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而是这样一种实在论,它把语言当作认识论分析的基础。我坚决主张,为了使我们的经验获得意义,我们必须能够谈论这些经验,用语言表达它们。因此,‘掌握语言意味着什么?’成为我们的核心问题。”^① 伊斯雷尔在这本书里,用语言分析的方式重新解读了马克思著作,提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

^① [瑞典]伊斯雷尔:《辩证法的语言和语言的辩证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第2页。

和辩证法的若干新颖见解。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马克思的论述是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哲学框架,而具有现代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意义。

另外,西方的一般哲学家仅仅从哲学问题重心的转移的角度来理解语言学转向这一趋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它。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说:“我认为,用语言作模式或以语言为比喻的更为深层的理由必须在是否具有科学性或是否代表科技进步这些问题以外的其他地方中寻找。实际上,它就在当今所谓先进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具体性质之中。这些国家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世界图景:在那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而各种各样的信息却达到了饱和的程度;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商品网络,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和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规律的、虚妄的恶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关系。”^①杰姆逊的这个观点应当说是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语言学转向的潮流。通过这种分析,可以看到,现代哲学文化思潮出现语言学转向,首先在于现代社会本身已经相当语言化、符号化。比如货币是财富的符号,这个符号古已有之,但是从来没有在现代社会中那么醒目耀眼。人的尊卑贵贱,人与人的关系,都可以用货币这个符号来衡量和判断。社会关系的商品化、货币化,人的商品化、货币化,就是一种人与社会的符号、语言的存在方式。人与社会的实际关系,被符号关系所取代。而只有通过符号关系,才能把握实际关系。当代流行的、甚至充斥整个社会的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信息、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符号化的标志。我们生活在符号中,生活在语

^① [美]杰姆逊:《语言的牢笼》,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4页。